

长水集

下

谭其骧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 王师颀

长 水 集

CHANGSHUI JI

(下)

谭 其 骥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34,000 字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书号 11001·721 定价 3.95 元

目 录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 安流的局面.....	1
(附: 读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 长期安流的原因》后.....)	邹逸麟 33
《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	39
附考一: 《汉志》滹水下游故道.....	54
附考二: 《水经》易水巨马河下游故道.....	55
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	56
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	87
碣石考.....	98
云梦与云梦泽.....	105
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 考察简报.....	126
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	141
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	152
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	160

《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

后记·····	179
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	186
鄂君启节铭文释地·····	193
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	212
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	233
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 地理问题·····	246
唐北陲二都护府建置沿革与治所迁移·····	263
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	278
金代路制考·····	290
附一 宣抚司·····	305
附二 曷苏馆路考·····	306
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	309
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	315
历史上的金门与马祖·····	328
北河·····	331
阴山·····	334
陈胜乡里阳城考·····	336
郭著《李白与杜甫》地理正误·····	342
李德裕所谪之崖州·····	349
《汉书·地理志》选释·····	352

论曹操.....	406
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	421
读郭著《蔡文姬》后.....	437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 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

——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
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

一

提起黄河，人人都知道它在解放以前是一条灾害性很严重的河流，经常闹漫溢、决口、改道。这是历史事实。但从整个历史时期看来，黄河水灾的频率与严重性并不是前后一律的。我在 1955 年 5 月为中国地理学会所作的一次题为《黄河与运河的变迁》的讲演词^①里，已着重指出了这一点。在那篇讲演词里，我把从有历史记载以来直到解放为止全部黄河历史，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前后二期，指出黄河在前期决徙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只是到了后期，才变成决徙频仍，有害无利，并且越到后来闹得越严重。同是这条黄河，为什么前后情况大不相同？我把原因归之于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的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湖泊的逐渐被淤废。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种看法基本上不错。可是尽管不错，却解决不了黄河史上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几千年内，黄河的灾害并不是一贯直线发展，而是中间有过一个大曲折的；森林与草原既然在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与湖

^① 载《地理知识》1955 年 8—9 期。

泊既然逐渐在被淤废，那末黄河的灾害按理应该是一贯直线发展的，何以会中间出现大曲折呢？在那篇讲词里，我只是含糊笼统地说河患前期少而后期多，所以乍听起来，似乎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可是只要我们把前后二期黄河的决溢改道稍稍具体排比一下，马上就可以发现：前期的灾害诚然比后期少，但在前期本身范围内，显然并不是越到后来闹得越凶。那末又是为了什么呢？说老实话，当时我并不能解答这一问题。

现在让我们先把唐以前即前期黄河决溢改道的具体情况叙述一下。在这一期中，又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从有历史记载即殷商时代起，到秦以前。在这一千几百年的长时期内，关于黄河决溢改道的记载很少。商代屡次迁都，过去有人认为与黄河决溢有关；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充分论据。西周时代，也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春秋时代有一次改道，就是周定王五年那一次^①，通常称为黄河第一次大改道。战国时代溢了一次^②，决了三次^③；而三次决口都不是黄河自动决，都是在战争中为了对付敌人用人工开挖的。这时期河患记载之所以如此之少，一方面应该是由于上古记载缺略，一方面也是由于那时地广人稀，人民的耕地居处一般都选择高地，虽有决溢不成灾害之故。再有一方面也不容否认，那就是其时森林、草原、支津、湖泊还很多，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也确乎不会轻易决口改道，除非是遇到特大洪水。

第二期，西汉时期。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起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 11 年）止一百八十年中，黄河决溢了十次之多，其中五次都导致了改道，并且决后往往听其漫流，历久不塞。

① 见《汉书·沟洫志》。

② 见《水经·济水注》引《竹书纪年》。

③ 见《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史记·赵世家》肃侯十八年、惠文王十八年。

要是决后即塞,从当时情况看来,决溢次数势必更多。决溢所造成的灾害很大,泛滥所及往往达好几个郡,好几十个县,坏官亭民居以数万计,浸灌良田至十余万顷。当时下游濒河十郡,每郡治堤救水吏卒多至数千人,岁费至数千万^①。可见西汉一代的河患是很严重的。因而也就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重视,司马迁就写了《河渠书》,班固就写了《沟洫志》。这两篇书的内容虽不是完全讲黄河,但主要是讲黄河;从篇后的“太史公曰”和“赞”看来,作者载笔的动机也显然是有感于河患的严重。

若是单把第一和第二两期比较起来看,虽然中间的变化太大,未免觉得有点突然,毕竟还是合乎原来所假定的河患日趋严重的规律的,还不容易看出问题。问题显示在:到了第三期,河患却又大大地减轻了。

第三期,东汉以后。黄河自王莽始建国三年决后不塞,隔了将近六十年之久,到东汉明帝十二年(公元69年)夏天,才发动了数十万劳动人民,在我国历史上著名水利工程师王景的主持之下,大致按着始建国以来的决河经流,从荥阳(故城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到千乘(故城在今山东旧高苑县北)海口千有余里,大规模地予以修治。到第二年夏天,全部工程告竣^②。(西汉以前黄河在今河北境内入海,此后即改由山东入海)从此以后,黄河出现了一个与西汉时期迥不相同的局面,即长期安流的局面。从这一年起一直到隋代,五百几十年中,见于记载的河溢只有四次^③:东汉一次^④,曹魏二次^⑤,西晋一次^⑥;河水冲毁城垣一次,晋末^⑦。到了唐代比较

① 见《汉书》文帝纪、武帝纪、成帝纪、沟洫志、王莽传。

② 见《后汉书》明帝纪、王景传。

③ 专指发生在下游地区的,在中上游的不计。

④ 见《后汉书》桓帝纪永兴元年、五行志。

⑤ 见《晋书·傅祗传》、《三国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宋书·五行志》。

⑥ 见《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五行志;《宋书·五行志》。

⑦ 见《水经·河水注》、《元和志·郢州卢县》。

多起来了,将近三百年中,河水冲毁城池一次,决溢十六次,改道一次^①。论次数不比西汉少,但从决溢的情况看来,其严重程度显然远不及西汉。就是景福二年(893年)那次改道,也只是在海口地段首尾不过数十里的小改道而已。总之,在这第三期八百多年中,前五百多年黄河安稳得很,后三百年不很安稳,但比第二期要安稳得多。

在河患很严重的第二期之后,接着出现的是一个基本上安流无事的第三期,这一重大变化应如何解释?历史记载有所脱略吗?东汉以后不比先秦,流传至今的文献极为丰富,有些小范围内的决溢可能没有被记录下来,较大规模的决徙不可能不见于记载。从《后汉书》到两《唐书》所有各种正史都没有河渠或沟洫志,这当然是由于自东汉至唐黄河基本上安流无事,无需专辟一篇之故;否则《史记》、《汉书》既然已开创了这一体制,后代正史皆以其为圭臬,决不至于阙而不载。再者,成书于东汉三国时的《水经》和北魏的《水经注》、唐代的《元和郡县志》中所载的黄河经流,几乎可以说完全相同,并无差别,更可以证实在这一时期内的黄河确乎是长期安流的。

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既然是事实,所有讲黄河史的人,谁也没有否认过;那末,我们要讲通黄河史,当然就有必要把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找出来。我个人过去一直没有找出来,因此在1955年那次讲演里只得避而不谈。前代学者和当代的历史学家与水利学家谈到这一问题的倒很不少,可是他们的解答看来很难令人信服。诸家的具体说法虽不完全相同,着眼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着眼于王景的治导之法,都认为东汉以后黄河之所以“千年

^① 见两《唐书》五行志:高宗、武后、代宗、宪宗、文宗、懿宗、昭宗纪;《元和志·郾州》、《寰宇记·滨州》。

无患”^①，应归功于王景的工程技术措施“深合乎治导之原理”。清人如魏源^②、刘鹗^③，近人如李仪祉^④，以及今人如岑仲勉^⑤，都是如此看法。《后汉书·王景传》里所载关于王景治河之法，只有“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洫，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润注。”三十三个字。诸家为这三十三个字所作的解释，估计至少在万言以上。直到最近，1957年出版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的《人民黄河》，也还是如此看法。只是加上了这么一句：“当然”，黄河在王景后数百年间“决溢次数少的原因可能还另有一些”。只说“可能”，并未肯定。到底另有一些什么原因，也未交代。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真实情况的。即令王景的治导之法确乎比历史上所有其他治河工作者都远为高明（其实未必），他的工程成果顶多也只能收效于一时。要说是一次“合乎治导之理”的工程竟能使黄河长期安流，“功垂千载”，这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首先，这次工程的施工范围只限于“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即只限于下游；工程措施只限于上引三十三个字，这三十三个字用现代语概括起来，无非是整治河床，修固堤防，兴建水门。稍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黄河的水灾虽然集中于下游，要彻底解除下游的灾害，却非在整个流域范围内采取全面措施不可，并且重点应在中上游而不在下游；单靠下游的修防工程，只能治标，谈不上治本。王景的工程正是一种治标工作，怎么可能收长治久安之效呢？其次，就是下游的防治工程，也必须经常不断地予以养护、培补、加固，并随时适应河床水文的变化予以改筑调整，才有可

① 五代宋初黄河决溢次数虽已很多，灾害很严重，但或仅小改道，或改后不久即恢复故道。到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才大改道至今天津入海，从永平十三年算起至此将近一千年。

②③ 见《再续行水金鉴》卷一五四、一五八引。

④ 见《科学》7卷9期。《水利月刊》9卷2期1935年。

⑤ 见《黄河变迁史》第八节七。

能维持久长。试问，在封建统治时代，有这个可能吗？何况，王景以后的东汉后期，不正是封建政权最腐朽无能的时代吗？东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不正是长期的割据混乱时代吗？在这样的时代里，难道有可能始终维持着一套严密而有效的河防制度吗？

工程技术因素说讲不通，那末，能不能用社会政治的因素来解释呢？我们不可否认社会政治因素有时会对黄河的安危发生巨大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解放以前经常决口，甚至一年决几次，解放以后，就没有决过。过去还有许多人把五代、北宋的河患归罪于五代的兵祸，把金、元、明的决徙频仍推咎于宋金、金元间的战争，听起来似乎也还能言之成理。可是，我们能拿西汉来比之于解放以前，拿东汉来比之于解放以后吗？即使勉强可以说唐代的政治社会情况比西汉强，总不能说东汉、魏、晋、南北朝比汉、唐强吧？魏晋南北朝跟五代、宋金之际同样是乱世，为什么黄河的情况又截然不同呢？可见社会政治因素说同样讲不通。

前人并没有解决得了这个问题，而这又是一个黄河流域史里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整个儿中国史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二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从黄河下游决溢改道的根本因素讲起。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降水量集中在夏秋之季特别是夏季，河水挟带大量泥沙，是黄河善淤善决的两个根本原因。近几十年来的水文实测资料又证明：决溢改道虽然主要发生在下游，其洪水泥沙则主要来自中游。因此，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中游，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中游去，看看中游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条件是否有所不同，特别是东汉以后数百年间，比之前一时期和后一时期是否有所不同？

黄河中游上起内蒙古河口镇大黑河口，下迄河南秦厂沁河口。就河道而言，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河口至山西禹门口；第二段，自禹门口至河南陕县；第三段，自陕县至秦厂。就流域而言，相应可分为三区：第一区，包括内蒙古河套东北角的大黑河、沧头河流域，和晋西北、陕北东北部、伊盟东南部的山陕峡谷流域；第二区，包括山西的汾水、涑水流域，陕甘二省的渭水、泾水、北洛水流域，和河南弘农河流域一角；第三区，包括豫西伊洛河流域，和晋东南沁丹河流域。

根据黄河沿岸各水文站近几十年来的实测记录，这中游三区跟下游水灾之间的关系大致是这样的：

一、洪水 下游发生洪水时的流量来自上游的向不超过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来自中游。中游三区夏秋之际经常有暴雨，由于地面蓄水能力差，雨后立即在河床中出现洪峰。三区的暴雨都经常能使本段黄河河床里产生一万秒立方米以上的洪水。如两区或三区暴雨后所形成的洪峰在黄河里碰在一起，那就会使下游河床容纳不了，发生危险。而这种洪峰相遇的机会是很多的，尤以产生于第一第二两区的洪峰相遇的机会为最多。

二、泥沙 情况与洪水有同有不同。同的是中下游河床中来自上游的泥沙很少。在流经陕县的巨量泥沙中，来自河口镇以上的只占 11%。在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包头市，每立方米河水中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只有六公斤。不同的是中游三段河流的输沙量极不平衡。第一段由于该区地面侵蚀剧烈，干支流的河床比降又很大，泥沙有冲刷无停淤，故输沙量多至占陕县总量的 49%，河水的含沙量则自包头的 6 公斤到禹门口骤增至 28 公斤。第二段由于泾、渭、北洛的含沙量虽很高，但各河下游都流经平原地区，禹门口至陕县的黄河河谷也相当宽阔，有所停淤，故流域面积虽远较第一段为大，而输沙量反而较少，占陕县总量的 40%，河水含沙量到陕县

增为 34 公斤。陕县是全河沙量最多的地点。此下的第三段，伊洛、沁丹各河的含沙量本来就比第一第二段各支流少，并且各河下游有淤积，黄河自孟津以下也有淤积，故输沙总量即不再增加。

如上所述，可见中游三区中，第三区对下游的关系比较不重要；它只是有时会增加下游一部分洪水，而并不增加泥沙。对下游水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一第二两区；因为淤塞下游河道的泥沙，十之九来自这两区，形成下游暴涨的洪水也多半来自这两区。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两区的水土流失情况，在于在整个历史时期内，这两区的水土流失是直线发展，一贯日渐严重化的呢，还是并不如此？

一地区的水土流失严重与否，决定于该地区的地形、土壤和植被。黄河中游除少数山区外，极大部分面积都在黄土覆盖之下。黄土疏松，只有在良好植被保护之下，才能吸蓄较多的降水量，阻止地面径流的冲刷。植被若一经破坏，一雨之后，土随水去，水土流失就很严重。加以本区的黄土覆盖极为深厚，面蚀很容易发展成为沟蚀，原来平坦的高原，很快就会被切割成崎岖破碎的丘陵，水土流失也就愈益严重。所以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水土流失严重与否，又主要决定于植被的良好与否。

历史时期一地区的植被情况如何，又主要决定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的方式。如果人们以狩猎为生，天然植被可以基本上不受影响。畜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活动同样都会改变植被的原始情况，而改变的程度后者又远远超过前者。因为人们可以利用天然草原来从事畜牧，只要放牧不过度，草原即可经久保持，而要从事农耕，那就非得先把原始森林和原始草原予以斫伐或清除不可。

但同样从事农耕，其所引起的水土流失程度，却又因各地区的地形、土壤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就黄河中游第一第二两区而论：

第一区的河套东北角地区和第二区的关中盆地和汾、涑水流域,大部分面积是冲积平原和土石山区。冲积平原由于地势平坦,土石山区由于石厚土薄,不易形成沟壑,故开垦后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一般比较轻微。第一区的山陕峡谷流域和第二区的泾、渭、北洛河上游地区,几乎全部是黄土高原或黄土丘陵;黄土深厚,地形起伏不平,故一经开垦,面蚀与沟蚀同时并进,水土流失就很严重。

由此可见,在这对黄河下游水患起决定性作用的中游第一第二两区之中,最关紧要的又在于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地区;这两个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情况的改变,是决定黄河下游安危的关键因素。

三

在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早期,即战国以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这二地区基本上应为畜牧区;射猎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想必不会没有,但很不重要。这二地区与其南邻关中盆地、汾涑水流域在地理上的分界线,大致上就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在此线以南,早自西周以来,即已进入农耕时代;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以农为主的秦人和晋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此线以北,迟至春秋,还是以牧为主的戎狄族活动地区;自春秋中叶以至战国,秦与三晋逐渐并吞了这些地区,但畜牧仍然是当地的主要生产事业。产于晋西北今吉县石楼一带的“屈产之乘”^①,在春秋时是有名的骏马。战国末至秦始皇时,乌氏堡在泾水上游的乌氏地方(今甘肃平凉县西北),以畜牧致富,其马牛多至用山谷来计量^②。

① “屈产”二字,《公羊传》僖公二年何休注解作产马地的地名,《左传》杜预注解作产于屈地。今石楼县有屈产水。古屈邑在今吉县境内。

② 见《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虽作于汉武帝时，其中关于经济区域的叙述则大致系战国至汉初的情况。它把全国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区域，山西的特点是“饶材、竹、穀、𦉰^①、旄、玉、石”，龙门碣石北的特点是“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当时所谓山西本泛指函谷关以西，关中盆地和泾渭北洛上游西至黄河皆在其内。但篇中下文既明确指出其时“自汧、雍以东至河、华”的关中盆地是一个“好稼穡，殖五谷”的农业区域，可见此处所提到的“材、竹、穀、𦉰、旄”等林牧业特产，应该是泾渭北洛上游及其迤西一带的产物，这一带在当时的林牧业很发达。龙门碣石北的特产全是畜产品。碣石指今河北昌黎县北碣石山。龙门即今禹门口所在的龙门山，正在关中盆地与汾涑水流域的北边分界线上。可见自龙门以北的山陕峡谷流域，在当时是一个以畜牧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区域。同传下文又云：“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天水陇西二郡位于渭水上游，北地郡位于泾水上游，上郡位于北洛水上游和山陕峡谷流域。下文又云：杨与平阳“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慎，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故杨、平阳陈掾（犹言经营驰逐）其间得所欲”。杨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平阳在今临汾县西南；秦指关中盆地；翟指陕北高原故翟地；种、代在石北，“石”指今山西吉县北石门山，“石北”约相当于现在的晋西北。这条记载生动地说明了当时晋西北人民的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试和它的近邻晋西南汾涑水流域即当时所谓“河东”的“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一对比，很显然前者是畜牧射猎区的情况，后者是农业商业高度发展地区的情况。正由于石北跟河东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经济区域，因而通贾于这二区之间的杨与平阳二地的商人，能得其所，杨与平阳也就发展成了当时

①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贞《索隐》：“穀，木名，皮可为纸。𦉰，山中纆，可以为布。”

有名的商业城市。

《汉书·地理志》篇末朱赣论各地风俗，也提到了渭水上游的天水、陇西二郡“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泾洛上游和山陕峡谷流域的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四郡“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用以印证作于西周末至春秋初的国风秦诗中所描述的当地人民经常以“车马田狩”为事的风气。这种风气并且还一直维持到“汉兴”以后，西汉一代的名将即多数出身于这六郡的“良家子”。

战国以前黄河下游的决徙很少，我以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年代，所以原始植被还未经大量破坏，水土流失还很轻微。

四

到了秦与西汉时代，这二区的土地利用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秦与西汉两代都积极地推行了“实关中”和“戍边郡”这两种移民政策。“实关中”的目的是为了“强本弱末”。所谓“本”就是王朝的畿内，即关中地区；把距离较远地区的一部分人口财富移置到关中，相对地加强关中，削弱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借以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就叫做“强本弱末”。“实关中”当然主要把移民安顿在关中盆地，但有时也把盆地的边缘地带作为移殖目的地。例如秦始皇三十五年徙五万家于云阳^①，汉武帝太始元年、昭帝始元三年、四年三次徙民于云陵^②，云阳和云陵，都在今淳化县北，即

①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见《汉书》武帝纪、昭帝纪。

已在泾水上游黄土高原范围之内。“戍边郡”就是移民实边，目的在巩固边防。当时的外患主要来自西北方的匈奴，所以移民实边的主要目的地也在西北边郡；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至为广泛，黄河中游全区除关中盆地、汾涑水流域以外都包括在内，黄河上游、鄂尔多斯草原和河西走廊地带也都包括在内，而其中接受移民最多的是中游各边郡和上游的后套地区。

秦汉两代“戍边郡”的次数很多，每次规模都很大。秦代是两次：

第一次，始皇三十三年，蒙恬“西北斥逐匈奴”，“取河南地”，“筑四十四县”，“徙适戍以充之”^①。这次移民历史记载上虽没有提到人数，既然一下子就置了几十个县，想来至少也得有几十万。所谓“河南地”应该不仅指河套地区即当时的九原郡，迤南的陕甘北部即当时的上郡和北地二郡，也应包括在内。其时蒙恬统兵三十万，负责镇守北边，即经常驻扎在上郡。

第二次，始皇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②。“北河”指今河套地区的黄河，榆中指套东北阴山迤南一带。

这两次移民实边规模虽大，对边地的影响并不太大。因为始皇一死，蒙恬即被杀，接着就爆发了农民大起义，“诸秦所徙适戍远者皆复去”，匈奴“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③。但也不会毫无影响。因为“复去”的只限于“远者”，可见适戍在较近处的即未必复去。

此后约四十年，汉文帝听从了晁错的计议，又“募民徙塞下”。这次是用免罪、拜爵、复除等办法来劝募人民自动迁徙的，所收效

① 见《史记》始皇本纪、匈奴列传。四十四县本纪作三十四县，此从《匈奴传》、《六国年表》。

②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见《史记·匈奴列传》。